

赵明义等 著

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真谛

YOUZHONGGUOTESESHEHUIZHUYILUNCONG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论 丛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

赵明义 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赵明义等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9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李文海主编)

ISBN 7-209-02441-7

I. 有… II. 赵…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 中国 IV. D61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

赵明义 等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4 插页 39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9-02441-7

D·583 定价: 23.50 元

·C112·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

主	任	李文海		
副	主	任	陶德麟	田心铭 张士宝
委	员		黄楠森	许征帆 高鸿业
			钟哲明	郑德荣 赵明义
策划·组织		张士宝	任青	李运才

本书主要作者(以撰稿先后为序)

赵明义	臧秀玲
宋云峰	李宏

总 序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李文海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校 长

我们刚刚隆重纪念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从这次全会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如果没有在这个科学理论指导下 20 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实践,也就不可能有这一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

这套“论丛”,在 1999 年出版,从时间上说,虽然并非刻意的安排,却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80 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50 年前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前面提到的 20 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 1999 年是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因此,当人们在此时估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意义时,便十分自然地会引发起从世纪历史的角度去思考的兴趣。

“社会主义”一词,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在上一个世纪末,我国的政治界和思想界就有过几次传播“社会主义”的热潮。但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还多半是作为一种学理来进行宣传和讨论,传播或者鼓吹者大抵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有些人即使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所了解和追求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相去甚远。直到五四运动前

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把社会主义真正作为一种长远追求的崇高目标。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在20世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20世纪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可以说是探索的世纪、变革的世纪、发展的世纪,而所有的探索、变革和发展,都是紧紧围绕着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就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这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的。大体说来,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终于完成了头一个历史任务,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本世纪上半叶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标志。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民族振兴的广阔道路。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带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失时机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在探索过程中,在变革过程中,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一直到进入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本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此迅猛而深刻的发展变化。在即将迈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以如此坚定的步伐,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英勇奋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任何成例可援的创造性事业,当然也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经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者理应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不断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使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及时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和组织编写的。

在酝酿组编这套“论丛”的时候,作者、编者和出版者曾在一起做过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这套丛书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一是要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这当然毫无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既然是一个完备的科学体系,自然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加以对待。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甚至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实用主义等现象,还是屡见不鲜。这种不良学风,既损害了邓小平理论的声誉,又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是应该坚决避免和反对的。二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重大问题,不仅要有理论的阐述和说明,而且要有对有关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剖,避免从书本到书本,空发议

论,而应始终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三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做到两个服务,即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对学术问题,要提倡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和相互切磋;对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引导,以理服人;对事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同时,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既不应该回避,也不应该只限于对既往事实的经验总结,应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把理论宣传和决策咨询的作用更好地统一起来。

这套“论丛”的作者,大多是各高等学校的资深教授和学术名家,也有一部分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他们努力按照上面提到的编写原则,深入钻研,精心写作,共同完成了全部 12 种著作。对于他们严肃认真的治学作风,我代表编委会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我们也要对山东人民出版社决定组织、出版这套“论丛”以及在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致谢。至于这套丛书是否真正达到了上面所说的要求,我们只能把评判的权利交给读者朋友。不论读者朋友对作品做出什么评价,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以这套丛书,作为参与其事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告别难忘的 20 世纪、迎接辉煌的 21 世纪的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1999 年 1 月 11 日

于人民大学林园

前 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一书,是山东大学国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学科点的赵明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最终成果。赵明义教授承担全书的指导思想、框架设计、各卷主要思路的确定及通修定稿工作。刘玉安教授参与了课题组的集体讨论及“卷二”、“卷四”的初审工作。方雷博士协助课题组负责人做具体工作。

该书各部分的作者如下:

导论和卷一至卷四的卷下序——赵明义;“卷一”——赵明义,方雷、杨鲁慧、徐艳玲参与了部分起草和撰稿工作(方:“一”中的(一)和(二)内的“1”,杨:“二”中的(二)内第一、三至十,徐:“二”中的第(三)部分);“卷二”——臧秀玲;“卷三”——宋云峰,楚成亚参与撰写了“七”中的(五)、(六)部分;“卷四”——李宏。

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在此谨向有关专家、学者深表谢意。教育部社科中心的田心铭主任及任青、李成志同志,山东人民出版社张士宝社长和李运才同志对该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之该课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和复杂,所以可能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9年5月

导 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科学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成果。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的提出,是针对有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观上随意解释和发挥,把这一理论与实践本不包含的意思或道理强加于它并加以传播的问题。比如国外政界或学界中,有人为了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以直接或拐弯抹角的方式,给其扣了三顶帽子:(1)“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2)“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3)“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某些非正式场合也流传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旗号、资本主义的内容、封建主义的特色”等论调。这种观点,不是有意歪曲、恶意攻击,就是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某些现象不能从本质上加以认识和把握而产生的误解。此外,还有的人,动机是好的,但因缺乏理论研究和宣传上的严肃性,而发生不能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的问题。其表现是:在探索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为了所谓“创新”或“新颖”,把自己的一些不符合这一理论与

实践本来含义的道理或观点也加在它的身上。结果,不但违背了自己为宣传与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贡献的初衷,反而给这种研究与宣传造成某种混乱。

基于上述情况,本课题组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除力图避免发生“欲帮忙而添乱”的情况之外,在正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义及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论述和实证研究,力争较有说服力地分别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

根据以上思路和要求,经课题组反复研讨,将本书的框架设计为“四卷”:卷一:科学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卷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兼析“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论”;卷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兼析“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论”;卷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兼析“有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论”。

(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何在?“真谛”,在词语学上,即指真实意义或含义,也就是“真实的道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就是探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真义。

那么,如何把握这一理论和实践之真谛或真义呢?为此,必须忠实于邓小平对这一理论和实践的论述,深刻理解其论述的

精神实质。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准确地界定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这两段话,对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真谛”极为重要。所以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11个方面全面总结了2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之后,便将其归结到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的那段著名的、具有历史性结论的话。他指出:“二十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可以概括为十一个方面:(一)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二)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三)必须集中力量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位;(四)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五)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六)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七)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八)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63页。

政治局面;(九)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十)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十一)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二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由此可见,欲要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研究思路及方法。首先,要认真钻研和思考邓小平 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那段具有“历史性结论”意义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篇之论;然后,再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足迹,去研读江泽民总结、概括的我国 20 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 11 条历史经验;接着,再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的重点文章,思考、探寻他是如何将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的;在研读过程中还要特别重视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等重要文献,以便准确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精神实质。这样学习、研究,就能够比较好地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

要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从基本内容上说,最重要的是要弄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所包含的三个基本关系: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二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我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间的关系;三是在建设有中国

^① 《人民日报》1998 年 12 月 19 日。

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走自己的路和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成果、先进经验及正确汲取外国失败教训之间的关系。

1. “一脉相承、各具特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基本标志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源”和“流”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总源头,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离不开这个“源”;列宁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是“流”,而之于毛泽东思想则是“源”;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流”,而之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源”,是对它们的继承、发展与创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源”与“流”的关系,以“一脉相承、各具特色”八个字为基本标志。实践中忽略或放弃前者,那就会丢掉根本,丢掉“老祖宗”,在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迷失方向,走错道路;而忽略或放弃后者,那就会使本质上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之“老祖宗的根本”,因脱离不同时代特点、不同民族与国家的具体实际,而丧失发展与创新的源泉,变成僵化的教条,用其指导革命则害革命、指导建设则害建设,而自己还以为“最革命”、“最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左”倾教条主义,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根本”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也会损害甚至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正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各具特色”的关系,表现在三个层次上:

第一,立场、观点与方法层次。

首先要从立场上加以探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都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立场,这是一脉相承。然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因诞生于欧洲特别是英国,其居民的绝大多数人是工人阶级,所以是工人阶级立场和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从外延上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共产党宣言》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就是证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因其诞生地俄国和中国工人阶级在居民中不占绝大多数,而是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占大多数,所以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立场和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外延上表现为以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其他劳动群众;毛泽东思想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和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表现为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组成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邓小平理论的工人阶级立场和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表现为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一样,都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它们都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当然,“绝大多数人”概念中包括的内容,在俄国、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几乎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含义来说,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这种区别本身恰恰表明: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思主义是不断发展与创新的理论,它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而不是僵化的教条。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工人阶级的根本立场是不能动摇和改变的。

其次要从观点与方法上予以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一脉相承、各具特色的关系。这里说的观点与方法,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的观点、唯物辩证的方法,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历史诸领域运用的辩证与唯物的历史主义观点与方法。这一观点与方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认识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这一系列的一般发展规律,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什么是宇宙和宇宙如何演化与发展、什么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什么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如何发展以及它如何被社会主义代替、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成长为共产主义以及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等等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历史任务。

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完全一致。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等哲学著作,是在同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如此,列宁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所写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巨著,以及他晚年口授的五篇遗嘱性论文,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不论是列宁的专门哲学著作,还是在其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的著作中贯穿的哲学精神,都十分

明显地体现出了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方法的一脉相承和各具特色的辩证关系。正如斯大林所说,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它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列宁主义产生和处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加之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又横插一段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所表现的革命性与实践性特别强烈。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而列宁的观点与方法从头到尾贯穿了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的许多概念或范畴,都冠以“革命”和“实践”等字样。这是列宁的观点与方法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方法在一脉相承基础上的所具有的特色之所在。

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即观点与方法,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称得上是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哲学的大师。它在基本上属于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解决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建立了带有自己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观、社会主义观、共产主义观,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则是贯穿其始终的立场、观点、方法,它的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同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完全一致,但它确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连语言都是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

邓小平是马列主义者,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即观点与方法,当然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